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Essai d'anthropologie symétrique

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著 【法】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译 刘鹏 安涅思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学术新视野：当代科学技术论译丛

Nous N'avons Jamais Eté Modernes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法]布鲁诺·拉图尔 著

刘鹏 Agnès Chalier 译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法)拉图
尔著;刘鹏,安涅思译.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9

(学术新视野:当代科学技术论译丛)

ISBN 978-7-81137-516-9

I. ①我… II. ①拉…②刘…③安… III. ①人类学
—文集 IV.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2612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416 号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Essai d'anthropologie symétrique / by Bruno Latour / ISBN 2-7071-4849-0

Copyright@E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France, 1991,1997,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 书 名 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 著 者 [法]布鲁诺·拉图尔
- 译 者 刘鹏 安涅思
- 责任编辑 李寿春
-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 字 数 180 千
- 印 张 12.5
-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81137-516-9
- 定 价 25.00 元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献给凯瑞斯和艾德里安

中文版序言

从科学的世界步入研究的世界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要寻求一种能够充分反映此种变化的表达,我发现最合适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从科学(Science)转向了研究(Research)。科学意味着确定性;而研究则充满着不确定性。科学是冷冰冰的、直线型的、中立的;研究则是热烈的、复杂的、充满冒险的。科学意欲终结人们反复无常的争论;研究则只能为争论平添更多的争论。科学总是试图尽可能地摆脱意识形态、激情和情感的桎梏,从而产生出客观性;研究则以此为平台,以便使得其考察对象通行于世。

不幸的是,目前所有的仅仅是科学哲学,而缺乏研究哲学(Philosophy of Research)。公众的意念中存在着诸多陈词滥调的表述,他们将之视为理解科学及其神话的捷径;然而,人们却并没有努力使研究成为常识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在150年前所创立的那个学会〔1〕是为了促进科学发展的话,那么也十分有必要来考察一下一个研究促进会(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search)将是何等模样,它又会导致社会在本质上发生何等变化。

我们绝不可以将科学和社会先行分割而后定义之,它们依赖于同样的

〔1〕 拉图尔在此指的是成立于1848年的美国科学促进会。——译者注

基础：它们就像是由同样的“制度”〔1〕所界定的两个力量分支一样。如果你对此种“力量分割”做出改变，那么，你必须立刻改变你对科学之所是以及社会之所能为的观点。

或许，这是自科学产生以来所出现的最大变化。在与文化的其他部分发生关系的方式上，科学和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在第一种模型中，社会就像是桃子那柔软的果肉，而科学则是块坚硬的石头。科学为社会所包围，社会在本质上也异于科学方法之内在的运行方式：社会可以拒绝或者接受科学之成果，亦可以对其实践结果表现敌意抑或是友善之情；但是，一方面是科学结构的硬核，另一方面却是语境（对于一种自治的科学而言，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减缓或者加速其发展速度），此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一句老套之话道破所有天机：在此处的宫殿之中，伽利略在安置自由落体的命运；而在彼处的宫殿里，王子、红衣主教和哲学家们则在讨论人类灵魂的宿命。

科学扩散其结果、其道德规范、其方法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教育使自己在普通大众中间得以普及。在当时，由于年轻的美国对科学并不友好，因此，人们在第一时间创立了这一伟大的学会。时至今日，要在研究和我们犹犹豫豫所所谓的“社会”之间确立联系，将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要说明这一点，一个例子即已足够。1997年12月初，由法国肌肉萎缩治疗协会（AFM, the French Associ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uscular Dystrophy）所召集的一个病人群体，通过电视活动（一个冗长的慈善节目）为其慈善事业募集到了8000万美元的慈善基金。这一疾病能够导致肌肉障碍，而且可能由某种基因所引起，因此到目前为止15年以来，AFM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然而，令所有法国科学团体大跌眼镜的是，这项慈善基金却被临时用到了更为基础的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上，甚至比法国政府的投入还多！他们探索出了某些原创性的方法来描绘染色体的图谱，而且他们进展迅速、深入，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体的第

〔1〕 Latour, Bru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一组图谱——这令美国人大吃一惊，惊诧于他们的自诩！〔1〕〔2〕接着，在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他们解散了自己所建立的用以描绘染色体图谱的实验室，倾其全力投入到了对基因治疗的探索之中，尽管这是一条漫漫无期的冒险之路。

AFM 位于巴黎南部的宜维(Ivry)，它的建筑物的自身结构就显示了将科学与外在社会相隔离这一隐喻的局限：第一层是轮椅中的病人；第二层是实验室；第三层是管理部门；到处都是下一期募捐节目的海报和来访的捐赠者。科学在何处？社会又在何处？现在，它们被纠缠到了一起，永远都难以再分开。太超乎寻常了，病人们竟然利用基因决定论(在很多领域，这都被作为增强自然之决定论意味的一种方法)作为获得额外自由的工具。

正如最近某些迹象表明的，在很多其他的疾病领域〔3〕，诸多决定都是由病人、病人的家庭及其代表所作出，他们与某些具有新定位的科学共同体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现在，病人们制定了他们自己的科学对策，仿佛这已成为惯例。在这些例子中，社会的角色已经全然不同于其在传统模型中的模样。病人们不再苦等着科学一点一点地进入其日常生活，对于如何促进科学的进步，他们也不再满足于要么敞开心扉要么三缄其口。他们不再企盼着基因、病毒或者疫苗能够将他们的主观苦楚转变为客观决定。他们根据自身之需，接管了疾病的确诊工作以及科学对策的调整工作；他们绝对不会再指望科学能够为之提供确定性了，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也要承担研究的风险。毫无疑问，“病人”一词从未包含着如此多的行动和如此少的忍耐！

如何才能最好地表达出研究与社会之间的这一新政呢？在我看来，“集体实验”的观念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当下的精神实质。〔4〕

〔1〕 Weissenbach, Jean, et al. (1992), "A second-generation linkage map of the human genome", *Nature* 359: 794 - 801.

〔2〕 Cohen, D. and I. Chumakov, J. Weissenbach (1993), "A first-generation physical map of the human genome", *Nature* 366: 698 - 701.

〔3〕 Epstein, Steven (1996), *Impure Scienc.: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Callon Michel (1994), "Is Science a Public Good. Fifth Mullins Lecture,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23 March 1993",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 19 (4): 395 - 424.

科学协会创立之初，在科学家——当时这还是个新词——的心目中，科学应该一点一点地解决大多数的社会疾病。因此，人们也就认为科学可以消灭贫穷、迷信以及人类的其他愚行。退一万步讲，科学越是进步，人类的生活也就越好。对现代性的渴望——凭借着这种渴望，人们狂热地献身于科学事业——便可归因于这种绝对的确定性：存在着一个时间箭矢，它非常清晰地将人类黑暗的过去（在此处，激情和客观性混杂而居）与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在彼处，人性不会再将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主观性混淆起来）区分开来。对于一种永无止境的现代化（就像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神话一样）的信念，成为大多数科学家惊人力量的源泉；而且，这种现代化能够将人类陈腐的过去与开化的未来截然分开。

试图缩小荣耀的先辈与我辈之间的距离是毫无用处的。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世易时移！谁还会再相信这样一种对科学的纯粹召唤——而且，就此而言，永无止境的前沿又在哪里？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的科学化已经产生出了诸多美妙的废墟，但这绝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不过，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曲解在期望与现实之间那不断扩大的裂缝。很多人都说，科学的美梦已经破碎了，现代化已是油尽灯枯，原先所认定的良善之所现在则充满弊垢，时间的箭矢也绝不再指向进步性；面向新世纪的，与其说是一条康庄大道，倒不如说就是一盘意大利面条。甚至可以说，科学“没有未来”。科学应该被暴露于阳光之下，应该被彻底地揭露无遗，就像是被人类历史上最强的腐蚀剂所摧毁的一切幻想一样。上帝死后，人类开始从理性起飞。

对于这一巨变，我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从我们在那卑微的“科学论”领域中所做的实地工作中获得了些许启发。科学或许已经死了，但是研究将永存！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个“时间的箭矢”，但是，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区分了过去与将来。在过去，物与人纠缠在一起；在将来，它们将更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举例而言，没有人会相信生态学争论将渐行渐止，直到不再有人关心

环境的程度。^{〔1〕}与科学家和政治家一样,实践者亦不指望科学来简化其生活的网络——相反,他们倒希望研究能够增加实体的数量,而且他们在其集体生活中将与之遭遇。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集体实验”的观念体现出了它全部的分量。多年以来,欧洲人的生活与一种所谓的“疯牛病”交织在一起。对于与流行病学、非常规蛋白质、兽医监管、肉类的追踪管理、行业立法等相关的科学问题而言,人们期盼其不断进步和发展,但从未有人想一劳永逸地将“科学事实”从“意识形态”、“品味”和“价值”的社会语境中脱离出来。相反,人们反倒盼望着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不管人们如何对待由肉类、部长、骨头、蛋白质、病毒和食用牛所组成的复杂网络!^{〔2〕}

这就是最大的改变之处。科学不再步入一个混沌的社会后接着便为之制定秩序、简化其组成、终结其争论。它根本就没有进入,而只是为构成“集体实验”的其他所有组成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就如那美妙而又出人意料的朊病毒,它为普鲁兹奈[Pruziner]赢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奖)。尽管科学家们对此持保留意见,但是他们从未终止过政治活动:他们为集体过程的制造加入了新的实体。对于那些代表了人类及其需求的诸多代言人而言,他们新加入的那些代表,我该如何称谓这种关系呢?——非人类及其需求的代言人。

当实体的规模被考虑在内并与至高之善发生冲突时,这种纠缠甚至更加强烈。在《科学》杂志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3〕},科学家们以墨西哥暖流的名义声称,由于大西洋含盐量的变化,墨西哥暖流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这样一篇文章,就是我正在试图界定的研究与社会之间的新政的一个典型例子:一个非常巨大的新实体进入了“集体实验”,也被增加到了那构成人类与非人类之共同社会的组分的名单之中。除了朊病毒之外,又加入

〔1〕 Western, D. and R. Wright, Eds (1994), *Natural Connections: Perspectives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3〕 Broecker, W. S. (1997),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the Achilles heel of our climate system: Will man-made CO₂ upset the current balance?” *Science* 278: 1582 - 1588.

了墨西哥暖流！诸如此类的杂志每周都将大量的新实体呈现在公众面前，那又有谁会希望我们与它们相分离？现在，只有一件比死亡和税收更加确定的事情，那就是：相比过去而言，将来会更加光怪陆离。

尽管有点后知之明，但我们总算明白了，至今依然被视为科学发展阻力的“社会”的定义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拙思劣想。自始至终，人们一直都是在削弱科学主张之真理性和确定性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这一形容词的——如果人们说，一个结果是“社会建构”的，这即是说，它是错误的，至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这场你死我活的角力，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了。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选择。对于科学那古老的口号——一门学科愈是独立，这门学科就愈有前景——而言，现在，与之相对，我们提出一个更加现实的行动呼吁：一门科学学科愈是与其他领域相涉，这门学科就愈有未来。

当然是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改造我们的认识论，不得不调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颠覆社会科学的定义方式。伽利略在他那昏暗的狱房中独自喃喃自语：“不过，它是在运动！”日前在京都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在同一所宫殿的同一间房间里，各国的政府首脑、说客和科学家们济济一堂，共同讨论地球该何去何从。如果我们对这两个例子进行比较的话，就知道科学和研究之间的差别了。〔1〕

现在，科学家可以进行选择了：要么继续坚持一种理想科学的观念，而这是与19世纪中期的境况相适应的；要么向我们所有人、向大众阐述一种理想研究的观念，这更与当下我们所有人都深涉其中的“集体实验”相适应。

自科学革命以来，所有的罪恶都有充分的时间从门户洞开的潘多拉之盒中逃出。只有一件东西被留在了盒内，那就是希望。现在，或许是从中收获希望的时候了。

布鲁诺·拉图尔

〔1〕 Biagioli, Mario and Courtier, Galileo (1993),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 Culture of Absolut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英文版谢辞

本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例如,我对某些图表进行了改动,并增加了“何为拟容体”部分;另外,在不改变全书总体结构的前提下,对某些论证进行了强化或者澄清。我之所以没有使用经验例证,是为了保持本书的思辨风格——这恐怕可以说是非常高卢式的风格。在参考书目中,读者会发现大量的案例研究著作,其中也包括我所做的几个案例研究。在完成了几本经验著作之后,在此,我努力通过讨论某些与此领域相涉的哲学思想,试图将一个渐渐浮现的新领域——科学论——推到文化大众的视野之中。

为了使此书看上去至少不是荒唐无聊之作,许多人都付出了努力。在他们中间,我特别要感谢 Luc Boltanski, Francis Chateauraynaud, Elizabeth Claverie, Gerard de Vies, François Gèze 和 Isabelle Stengers。

我也非常感谢 Harry Collins, Ernan McMullin, Jim Griesemer, Michel Izard, Clifford Geertz 和 Peter Galison;我曾在他们的讨论会上介绍过本书的某些论点。

第二章的部分内容曾在“后现代? 不,简直就是反现代:走向科学人类学”(Postmodern? No, simply amodern: step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一文中发表,此文载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1: [1990] 145 - 171)。第三章的某些论述曾以另一种形式“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又一转向:慢慢步入非现代世界的科学论”(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easing science studies into the non-modern world)发表,此文载于麦克穆林(McMullin)主编的《科学的社会维度》一书(*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 Notre Dame: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72 - 292)。

目 录

Contents

中文版序言 /1

英文版谢辞 /1

1 危机 /1

1.1 杂合体的增殖(The Proliferation of Hybrids) /1

1.2 将戈耳迪之结重新系上 /3

1.3 批判立场(Critical Stance)的危机 /7

1.4 1989:奇迹之年 /10

1.5 成为一个现代人意味着什么 /12

2 制度(constitution) /15

2.1 现代制度 /15

2.2 波义耳及其客体 /18

2.3 霍布斯及其主体 /22

2.4 实验室中的转义 /24

2.5 非人类的证据 /26

2.6 实验室和利维坦都是人类的创造物 /29

2.7 科学表征与政治表征 /32

2.8 现代的制度担保者 /34

2.9 第四个担保者:被搁置一边的上帝 /38

2 / 我们从未现代过

- 2.10 现代批判的力量 /40
- 2.11 不可战胜的现代人 /43
- 2.12 现代制度澄清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 /46
- 2.13 控责的终结 /50
- 2.14 我们从未现代过 /53

3 革命 /57

- 3.1 现代人,亦是其成功的牺牲品 /57
- 3.2 何为拟客体 /59
- 3.3 横跨于裂缝之上的哲学 /64
- 3.4 终结的终结 /67
- 3.5 符号学转向 /71
- 3.6 谁忘记了存在 /74
- 3.7 过去的开始 /76
- 3.8 革命性的奇迹 /79
- 3.9 正在逝去之过去的终结 /82
- 3.10 分类与多重时间 /85
- 3.11 反哥白尼革命 /87
- 3.12 从传义者到转义者 /90
- 3.13 指控,因果性 /93
- 3.14 不同种类的本体论 /97
- 3.15 将四种现代资源联系起来 /100

4 相对主义 /104

- 4.1 如何终结不对称性 /104
- 4.2 广义对称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ymmetry Generalized)
/107
- 4.3 两种伟大分界的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 /110
- 4.4 从热带返乡的人类学 /114

- 4.5 文化并不存在 /118
- 4.6 尺度上的差别 /121
- 4.7 阿基米德的政变(coup d'état) /124
- 4.8 绝对的相对主义和相对相对主义 /127
- 4.9 世界祛魅过程中的一个小错误 /130
- 4.10 甚至是长网络亦全方面地保持了地方性 /133
- 4.11 利维坦是一团网络 /136
- 4.12 喜好边缘的怪癖 /139
- 4.13 请不要再错上加错啦 /142
- 4.14 不断增加的超验性 /145

5 重新分配 /149

- 5.1 不可能的现代化 /149
- 5.2 最后的审查 /152
- 5.3 重新分配人类主义 /155
- 5.4 非现代制度 /158
- 5.5 物的议会 /162

索引 /166

参考书目 /170

译后记 /179

1 危 机

1.1 杂合体的增殖 (The Proliferation of Hybrids)

像往常一样,我又拿起一份报纸,在报纸的第4页中,我了解到今年的测量数据表明南极洲的情形不容乐观:臭氧层空洞在不断扩大。继续读下去,文章将我的注意力从研究高层大气的化学家那里引向了阿托化学公司(Atochem)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首席执行官,人们指责这些公司破坏了生态环境,因此它们正在改进其生产线以取代那些无辜的含氟氯碳化合物(chlorofluorocarbon)。几段之后,报道继续写到,主要工业国家的政府首脑们深受化学、冰箱、空气浮尘和惰性气体的困扰。不过,文章最后指出,气象学家与化学家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他们在与人类活动无关的周期性波动上发生了争执。正因为如此,实业家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政府首脑们也同样举棋不定。我们应该继续等下去吗?现在是否已经太晚?在这一页的最下方,第三世界国家和生态学者们也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讨论了相关的国际政策、延期偿付、子孙后代的权利和发展权等问题。

这篇文章将化学家的反应与政治的反应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条线索就像是将最艰深的科学和最肮脏的政治联系起来;将千里之外的高空与里昂(Lyon)郊区的工厂联系起来;将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威胁与迫在眉睫的地方选举或者即将进行的董事会议联系起来。地平线、股票、时政、行动

者——所有这些之间都是不可通约的，然而在这里，它们却被同一个事件串联起来。

接着，在报纸的第6页中，我读到，在巴黎嘉莱(Gallo)教授实验室中的培养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希拉克先生(Chirac)和里根先生(Reagan)则庄严地宣称我们无法重现这一发现的真实历史；化工行业的发展并不迅速，患者组织迫切需要的治疗药物并未面世；而这种传染病却又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断传播。政府首脑、化学家、生物学家、绝望的患者和实业家又一次发现他们共同纠缠在了一个不确定性的经历之中，并将生物学和社会杂糅到了一起。

第8页讲述了有关日本所主导的计算机和芯片的发展历史；第9页分析了人们是否有权进行冷冻胚胎的实验；在第10页，我们得知一场森林大火所产生的浓烟，夺去了很多博物学家所极力保护的珍稀生物的生命；第11页谈到了鲸鱼，它们被戴上了装有无线电追踪装置的项圈；同一页还谈到了法国北部的一个矿渣场，由于它孕育出了一个珍稀植物群落，因此刚刚被确定为一个生态保护区；在第12页，围绕着避孕药具，教皇、法国大主教、孟山都公司、输卵管和德克萨斯原教旨主义者们非常奇怪地聚集到了一起；在第14页，作者在对高清电视的介绍中将德洛尔(Delors)先生、汤姆逊公司、欧洲经济共同体、标准化委员会、日本(又是日本)以及电影制造商放到了一起，即便仅仅是将标准改动哪怕那么几行，也将会导致数十亿法郎的耗费，同时也将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电视机、大量的电影以及不计其数的工程师，也很可能会使得大量的CEO们举步维艰。

幸运的是，报纸的其他几页讨论了一些纯粹的政治问题(激进党的一次会议)，另外也有一些文学类的报道，里面充满着小说家们自鸣得意的论调(“我深爱着你……可你却一点都不爱我”)。如果没有此类话题来慰藉我们的情绪，我们很可能将陷入糊里糊涂的境地。而在其他的部分，此类混合报道仍在不断增加，它们勾画出了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技术和小说之间的彼此纠结的情形。如果说阅读报纸是现代人的—种祈祷方式，那么今天，我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一边做着祈祷，一边读着这些杂合的报道。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自然，每天都在不断地重新组合并纠缠在

一起。

然而,似乎没有人发现这一问题。经济、政治、科学、论著、文化、宗教和地方事务,报纸的这些版面仍然保持不变,仿佛并没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发生。最微小的艾滋病毒,将你的注意力从性转移到不省人事者,接着又到了非洲、组织培养、DNA 和旧金山,但是分析人士、思想家、记者和决策者将会把病毒所追踪的这一网络切割成很细微的薄片,然后我们就只会发现单独的科学、经济、社会现象、地方新闻、情感和性。按下毫不知悉的喷气按钮,你可能开始你的南极洲之旅,接着可能又到了欧文市(Irvine)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里昂雄伟的山脉、惰性气体化学,接下来,可能去了联合国,但是这一脆弱的线索也可能被分割为诸多琐碎的片段,就像是真的存在着诸多纯粹的学科一样。无论如何,这似乎是在向我们诉说:请大家不要将知识、利益、争议和权力混合起来!请不要将天与地、全球性舞台与地方性场景、人类与非人类混合起来!“但是这种杂合体却在从事着这种混合性工作”,你可能会这样说,“它们将我们的世界编织到了一起”!分析家的回应却是“假装它们都不存在吧”。他们已经用一把利剑将戈耳迪之结斩断^[1]。车轭被斩断:有关事物的知识被放置到了左边;权力和人类政治被放置到了右边。

1.2 将戈耳迪之结重新系上

大约 20 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就一直在研究这些复杂的情形:我们生活于智力文化之中,但不知道如何为之分类。由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称呼,我们称自己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但是,对于这些庄严的学科标签,我们总是会加入一个限定词:

[1] 戈耳迪是希腊神话中小亚细亚佛律基亚国的国王,他曾将一驾马车置于宙斯神庙之中,并用绳索在车轭上打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死结,神谕凡能解开此结者,便是“亚洲之王”。后被亚历山大帝挥剑斩开。——译者注